

文章编号: 1006-6616 (2000) 01-0001-0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质工作 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历史使命

张彦英

(中国地质科学院)

今天是李四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第六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及《中国地质学》(扩编版) 首发式同时进行。现在又召开地质力学学术讨论会, 这都是地学界的重大事件。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质工作与新组建的地质科学院的历史使命”为题作一演讲, 作为对李四光先生的纪念, 也为我们这一学术讨论会尽一点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质工作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地质工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们几代人经过艰苦努力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从1950年李四光主持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工作, 到1952年中央成立地质部, 李四光出任首任地质部部长, 半个世纪以来, 几代人创造了辉煌业绩, 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以前我们对地质工作的划分是基础地质、矿产地质和水工环地质。这是按照地质工作的对象划分的。到了今天, 经济体制发生了变革,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地质工作按其经济属性划分为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公益性地质工作是非盈利性的, 为全社会服务的地质工作。它研究的对象是规律性的东西, 其成果是非一次性耗竭的。公益性地质成果, 无论用成本利润原则还是成本效益原则都是无法计价的, 它有使用价值, 而它的价值没法计算出来。因此, 公益性地质工作只能是国家投资, 成果社会共享。公益性地质工作包括地质科学研究工作、国土地质工作(区域地质、区域地球物理、区域地球化学、区域环境地质、区域工程地质和区域土地调查), 还包括矿产资源态势分析、地质环境态势评价, 影响国家安全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前期勘查工作以及依附于这些地质工作的技术、方法、情报资料等公共事业。公益性地质工作是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 是国家对国土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手段。因此, 国家必须有一支从事公益性地质工作的地质队伍。按照1994年朱镕基同志所讲, 要有一支“野战军”, 这支“野战军”是精兵加现代化, 国家财政开支, 成果社会公用。随着今年各省局地质队伍属地化的推进, 加快了这样一支公益性地质队伍组建的步伐。我们认为, 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下属队伍, 应该是公益性地质队伍的主要骨干力量, 当然还包括各省局、各部门从事公益性地质工作的地质队伍, 这就明确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地位和作用。

商业性地质工作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地质工作。它包括矿山企业为寻找接替资源而进行的地质勘查工作, 矿山企业为新建开发项目所作的资源勘查工作, 还包括工程项目特定的技术勘查工作以及纯粹是从事商业性地质勘查的勘探公司所进行的勘查工作, 等等。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商业性地质工作就其总量来说是主体。比如说美国商业性地质工作和公益性地质工作的比例是85:15、法国是80:20、澳大利亚是95:5,俄罗斯刚刚从集中的计划经济解脱出来,现在比例已经到了75:25。商业性地质工作,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一种主要形式。投资主体是利益主体,它是企业行为。

重组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历史使命如何呢?1999年7月16日,根据部决定,原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勘查技术院和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合并重组新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经过一个时期的调研,地科院党委理出一个基本的工作思路,叫做“三个结合,三个分类,三支队伍,五位一体”。就是要通过三个结合,进行三个分类,形成三支队伍,最后形成五位一体的国家级科学技术研究院。三个结合是指:研究与调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科技与生产结合。为什么现在要提三个结合呢?它是有针对性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比如说,程裕淇老先生逢会议必讲地质工作的三个结合。他讲的三个结合是调查和研究、室外和室内、点和面的结合,这是就地质工作本身讲的。他呼吁了很多年,他认为结合得不够,影响了地质工作的发展,确实如此。第二个结合呢?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因为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是程序性的东西。过去分工过细,往往造成结合不够,这次改革,从体制上给了一定的保证。比如说,中勘院侧重于技术方法,原地科院侧重于科学方面,那么体制的变革就是一种结合。这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大家说,中勘院的物化探所本来就是地科院的。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大师李四光、黄汲清、程裕淇先生,你说他是调查还是研究?他既是调查,又是研究,既讲科学,又讲技术,结合很紧,所以才成为一代宗师,攀上同代人的最高峰。而我们到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等种种原因,分工越来越细,互相分割,地质队伍重复,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实,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了。第三个结合呢?最后要变成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才能真正使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要实现三个结合,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进行三个分类。我们认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不同于中国科学院,它是以知识创新为主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也不同于经贸委系统的242个研究所,它是以开发性研究为主的。地科院是介于中科院与242个工业部门研究所的中间状态。所以,对我们下属11个研究所要分成三类,第一类搞基础研究、搞知识创新;第二类搞应用研究,包括非盈利性的公益性研究和开展国土资源大调查;第三类是搞开发性研究。我们给这三类的比重是,保证基础研究,加大应用研究,着力推进开发性研究。在改革初期,为了保持稳定,原建制不变。一个研究所有一种主体研究,还可能有的研究,只是比例低。到了某一天成熟的时候,象现在中科院所进行的一样,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他们有所谓“整合式”的、有叫“金蝉脱壳式”的等等。通过对这三种类型采用不同机制分类管理,推进改革,逐步形成三支队伍。这就是科技创新队伍、地质大调查队伍、科技开发队伍。三支队伍经过3至5年的努力,把我们地科院建成集创新—服务—调查—开发—培训于一体的国家级的研究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目前的现实问题是我们面临着两个两难选择。第一个是,既要稳定地质科学家和地质科技人员队伍又要分流大量人员的矛盾;第二个是既要加大科研和地质调查经费的投入,又要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的矛盾。这是现实问题,绕不过的,也回避不了的。我们不抱怨历史,不苛求前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这样看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在要的是怎样去面对现实,研究现实,不迁就现实而要改造现实。按照哲学规则,“两难选择”择其优,优在哪一边?那就需要有清醒的判断,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

除了这“两难选择”,我们还研究出一个操作程序。我们遇到的问题可能首先要说是没经费,这是事实,现在干什么都缺资金,缺经费。经费问题是不是第一位呢?举个例子,科技部

部长朱丽兰那儿有很多科技开发经费，但必须按照她那里的标准，不然就选不上。钱有，而且数目很大，你的项目要对上他的号才行。这么一说，好象首要问题不是经费问题，而是项目问题。你的项目能不能选上，就看国家与社会需要不需要，企业需要不需要。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许多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没有科研项目；另一方面中国的工农业又在低水平的重复，跨越式的发展，门槛跨不过去，科技含量不高。现在是过剩经济的时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好机会。去年长江发洪水是坏事，但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机会。当时低水平的重复的工厂没有砍掉，水一冲就没有了，重新建了科技含量高的工厂。这样看来先是选项目问题，不是经费问题。你有非常好的项目，企业需要，国家需要就能找到资金支持。比如说，中科院打一个报告给国务院，是关于如何解决中国钾肥资源问题的建议。这个报告提出，第一，中国到底有多少钾资源；第二，需要到外国去买多少钾肥；第三，我们到国外去开发钾资源，办工厂。报告建议国内钾肥生产基地，国际钾肥市场与境外钾生产基地三者之间应是1:2:1的关系。去年国产钾肥占使用总量的5.8%，94.2%是进口的。怎么办呢？温家宝副总理批给周永康部长，周永康部长让我们研究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钾肥问题？我们走访了专家，他们认为中国钾肥资源还有潜力。比如说，中国的寒武系、新生界等层位均有钾。另外，关于共生、伴生钾也没搞清楚。青藏高原锂、硼多伴生钾，还有其它元素，我们还说了一句话，你要把西藏地区通过资源开发搞活经济，那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上升成政治问题，给民族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巩固立了大功，关键是你有没有办法降低成本。西藏的资源开发，主要是成本降不下来。还比方说，有20位院士论证西南地区矿业开发，成本就是降不下来，总赔钱。对攀枝花周围大大小小的矿进行研究，联合攻关，想办法怎么把成本降下来。我参加了以李东英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的项目论证组，研究了一个以电带矿的办法。西南边疆地区水资源相当丰富，现在开发的不到10%，大量开发水资源发电，用便宜的电把选矿成本降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西藏的锂、硼、钾盐，有科学家提出用太阳能，这不要钱，还有提出用风力发电的等等。所以，与其说是没有钱，还不如说是没项目，这种事特别多。我们参加30届国际地质大会时，英国地调局局长Coorer讲了一句中国谚语，风吹来以后，怎么办？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墙把风挡住；第二个办法是用风发电，这是两种思路。现在我们首先是要有好的思路，才能有好的项目。好的项目怎么拿出来，需要人才。如果你单位没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项目当然拿不出来。项目要由人提出来，怎样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呢？那你必须有很好的机制，不然科学家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他受到压抑，做不出贡献。机制的作用能量是有限的，它终归要受到体制的制约。体制怎么变呢？首先要有思想理论基础，观念不变，一切无从谈起。

如此分析研究，我们就有了一个操作程序。首先是思想理论基础，是观念的转变；第二是要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第三，新体制下要有一个非常灵活的机制；第四是人才。有了好的机制，你的科学家、人才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你还可以引进人才，机制不好人家就跑掉了；第五是项目。对准社会需求、国家需要、企业需要的项目；第六，项目好，那肯定会有投入的。这样，既解决了国家、社会、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大推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又使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在推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